

守道与守官

□ 丁万明

《新唐书·褚遂良传》记载：褚遂良升任谏议大夫，同时负责记录皇帝起居注的工作。唐太宗问他：“你记录的君主言行，皇帝本人能查看吗？”褚遂良回答：“如今的起居注，就像古代的左右史官记录，无论善恶都如实记载，以此告诫君主不做违背礼法之事。但从未听说天子要亲自查看自己的史书记载。”唐太宗追问：“如果我有过失，你定会记录下来吗？”褚遂良答道：“守道不如守官，我的职责就是执笔直书，君主的举动必当如实记录。”大臣刘洎在一旁补充说：“即便褚遂良不记录，天下人也会记住的。”唐太宗闻言感慨道：“我有三条行事准则：一是以前代兴衰为镜鉴，二是任用贤良共谋治国之道，三是远离小人不受谗言迷惑。只要我能坚守这些原则，史官自然就无需记载我的过错了。”

这里需要说明：谏议大夫是中国古代谏官的一种，主要职责是向皇帝进谏、评议朝政得失，监督和纠正决策错误，属于监察谏议体系。而史官（如太史、起居注郎等）专司记录历史、编纂史册，负责记载君主言行与国家大事。两者职能不同，分属不同官职体系。但是，唐代存在官员跨系统兼职的现象，尤其是皇帝信任的重臣。比如褚遂良因学识渊博，“以谏官兼史职”，就是这种情况。

“守道不如守官”的内在逻辑

褚遂良任谏议大夫时，同时负责记录皇帝起居注的工作。起居注是记载帝王言行的档案性文件，而秉笔直书是记录起居注的一大原则，这自然会引起帝王们对自己历史形象的极大关注。唐太宗也不例外，所以他询问起居注的记录情况。褚遂良的回答很精到，他在说了忠实记录君主的善行恶事，为的是告诫君主不做非法越礼的事情的大告戒之后，又为自己的善恶皆记作了辩护性说明——“守道不如守官”。这样的道理，已经超越了起居注本身的单一功能，而具有了普遍

意义。

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，“道”与“官”的互动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治理逻辑。褚遂良提出的“守道”与“守官”，本质上揭示了意识形态与制度实践之间既依存又制衡的关系。“道”的范围主要是儒家推崇的伦理与价值观，作为社会的道德纲领与价值准则，既包含仁义礼智信的伦理体系，也承载着君主治国的理想追求，维系着社会的正统观念与政治的合法性；而“官”则是官僚体制的制度架构与运行规则，承载着规范权力、稳定秩序的现实功能，是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制度框架，比如唐代的科举取士、宋代的差遣磨勘（职务任命与考核升迁）。礼治文化之所以能维系封建社会两千年，正是因为“道”通过“官”实现了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化；科举制度考察举子对儒家经典的理解，并作为选拔标准；考课体系将忠孝观念作为地方治理的政绩指标；礼部仪制将伦理秩序编入法典条文。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社会“以官载道”的模式。

“道”与“官”的互相塑造

“道”与“官”并非简单的“体”与“用”的关系，二者在历史实践中经常呈现矛盾、碰撞、博弈、妥协、转化。贞观之治时期的名臣魏徵以敢于进谏著称，但当唐太宗让他处理尚书省久拖不决积压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时，《旧唐书·魏徵传》记载说“徵性非习法，但存大体，以情处断，无不悦服”。“但存大体”就是“守道”，“以情处断”则是“守官”。在“道”与“权变”中间寻求平衡，证明了当执政者具有崇高德行的时候，即便灵活变通，突破制度框架，也能实现善治；但更多时候，官僚体系需要以“明习文法”的硬性制度约束人性的弱点。

“官”所追求的稳定性需要“道”起到引领作用。褚遂良劝谏唐太宗时强调“守官”先于“守道”，本质上表达的是制度对权力的约束：史官秉笔直书，本质上是制度倒逼君主恪守道

德准则。唐太宗最终接受了褚遂良“臣职当载笔，君举必记”的职业准则，也就是接受了“官”的客观性对他“道”的主观性的矫正。这种矫正不仅体现在史官制度中，也渗透于整个传统官僚体系当中。中国传统社会通过“守官以载道”的治理智慧，在理想与现实、德治与法治之间寻求取得治理的平衡。这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“善治”。

“道”与“官”更深层的关系，是“道”对“官”的塑造。比如，唐代监察制度将“礼义廉耻”转化为御史台的弹劾条款。再比如，科举制度通过“四书取士”，将“四书五经”设定为考试范围，把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道德追求，具象化为“明经”“进士”的选拔标准，这样就吧儒家伦理灌注于整个官僚体系，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逻辑，成为行政实践。这种设计使“道”渗透到官僚体系的毛细血管——当士子们研习《春秋》微言大义时，他们同时也在内化“忠君爱民”的为官准则。制度体系需要道德价值不断为其赋予精神价值，否则就会沦为胥吏操弄的文书游戏。反过来，“官”也在塑造“道”。道德理想也需要依赖制度框架不断进行实践，否则就成了清谈误国的空中楼阁。从汉代“霸王道杂之”，到宋代“道理最大”，再到明清会典，传统中国社会不断在“经”与“权”、“常”与“变”当中寻求“道”与“官”的协调融合。

不能慎守为什么会导致体制臃肿

北宋欧阳修所撰的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中论述：如果当初制定的制度精密严谨，落实到具体事务上也能简便易行。之所以能做到这样，是因为每个职位都有固定职责，官员编制也保持稳定。唐朝鼎盛时期的制度便是如此。最初建立这些制度时，本就是想要确立规范、严明法纪，作为千秋万代的治国准则。但后来常常出现职权混乱、政令纷杂的局面，根源在于

不能谨慎维护制度，反而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。结果导致政务越处理越繁杂，官员数量越来越臃肿，最终使得官僚体系丧失原有职能，再也无法恢复当初的效能。

欧阳修对唐代官制的评价，肯定了唐代制度设计“法则精而密，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”的精密性、实施简易，也分析了如果不能慎守制度而导致的体制臃肿现象。这段论述也指出他心目中制度设计的精髓——贞观年间编纂的《唐六典》，将三省六部制、科举取士、均田制、租庸调制等编织成具有“咬合”特点的精密制度网络，使得盛唐时期，政府仅以数百名中央官员便能驾驭庞大帝国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尽管有数据统计盛唐时期中央文官约1500人，但其中包含散官、勋官等虚衔。

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，“官”作为制度实体与“道”作为精神内核的关系，构成了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。欧阳修所能看到的“道”“官”平衡最佳模式也就在唐朝了，这也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所在。今天我们审视历史，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矛盾在于，制度与道德的践行经常因为权力介入而扭曲。欧阳修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，他指出的“不能慎守”现象，恰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。避免或消解这种矛盾出现的方式，东西方大相径庭。和欧洲传统的多元制衡不同，中国传统政治主要依靠“史官直笔”“御史风闻”等源于内部的纠错机制，本质上是“道”对“官”的自我净化。这种依靠内生动力实现自我超越的治理智慧，体现在历代学者不断完善制度设计的努力当中，这种努力凝聚了历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维系华夏文明绵延的努力，凝聚在他们所不断追求的“道”与“官”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动态平衡与互相塑造。



（上接1版）

以实干实绩为标尺，让党员干部在知行合一、真抓实干中找准方向、校准坐标

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“既要想干事愿干积极干，又要能干事善于干”的重要要求。这就需要每一名党员干部始终找准干的方向、保持干的劲头、提升干的本领，把实干实绩作为衡量准绳，努力成为在思想、能力、作风等方面全面过硬的“施工队员”。

把实干实绩体现在对正确政绩观的忠实践行上。正确的政绩观体现的是价值导向，是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，是成事之基、实干之要。摆在首位的，就是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，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方向，坚定践行“四个放在”，聚焦建设“五个中心”重要使命，以科技创新为引领，以改革开放为动力，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，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，勇于开拓、积极作为，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，在躬身践行中创造不凡业绩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始终从人民整体利益、根本利益、长远利益出发，民有所呼、我有所应，在依靠和发动群众中实现共建共治共享。坚持长期主义，不驰于空想、不骛于虚声，摒弃急功近利的冲动和急于求成的浮躁，多做打基础、利长远、出实招、创实绩的事。

把实干实绩体现在对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上。在用主观力量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，必须把握和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。身处改革开放前沿，对党员干部而言尤其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，用辩证理性的态度、战略长远的眼光，洞见时代进程、洞察趋势规律，提升全球视野、战略思维和专业能力。想问题、办事情要立足上海，更要超越上海，多算国家账、战略账、长远账，不能把发展停留于总量或规模的尺度上，不能停留于对别人的学习模仿和跟不上，不能停留于核心技术和关键能力对他人的过度

依赖上，而要努力集世界之智、取各地之长、创上海之新。对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的新趋势新动向要有敏捷把握，对社会治理中存在的新矛盾新问题要有敏锐研判，这样才能不断增强战略主动。

把实干实绩体现在对解节难题的攻坚破解上。实干不是乱干，找准根节是前提，必须基于对内在机理的分析、底层逻辑的把握，把制约工作发展的关键根节找出来，把重心和力量聚焦上去；实干也不是蛮干，既不是漫无目的的横冲直撞，也不是平均用力的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，而是精确制导的“四两拨千斤”，从而形成“一子落，满盘活”。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，呈现出涉及范围广、触及利益深、关键难度大、关联性联动性强等突出特点，这就更加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、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、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，扭住关键、精准发力，敢于打破不合时宜的“条条框框”，敞开思想谋划新思路，放开手脚追求新突破，努力把改革进行到底。

把实干实绩体现在对工作任务的一抓到底上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，锚定目标和任务，只要认准是正确的事情，就一以贯之、坚持不懈干下去，日积跬步、日拱一卒、久久为功。上海三十年如一日持续推进旧区改造、城市更新，从“一年一变样、三年大变样”，到全面完成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，再到如今加快“两旧一村”改造、全力打好“拎马桶”问题攻坚战，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一以贯之、一抓到底。历史一定不会辜负实干者。不论什么工作，都要拿出“功成不必在我、功成必定有我”的胸怀和格局、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耐心和定力、“一锤接着一锤敲”的坚定和执着，初心不改、锲而不舍，以钉钉子精神抓到底、抓到位。

以组织的担当促进党员干部的作为，旗帜鲜明地把实干实绩导向树立起来

以实干创造实绩，不仅要靠党员

干部的自觉，也要用组织的关心关爱滋养激情勇气，充分调动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为大家干事当头的、奋力一跳保驾护航，在敢作善为中交出实干实绩新答卷。

激发干事创业“原动力”。政绩观与发展观、事业观、群众观紧密相连，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决定出什么样的业绩。把强化正确政绩观教育作为重要基础，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，做到学之愈深、行之愈笃、信之愈真；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、改革开放场景、人民城市案例，持续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深处深刻领悟政绩为准而树、树什么样的政绩、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问题，引导大家始终把党交付的工作当作一项事业去追求，拿出先锋队的样子、主心骨的风范、中流砥柱的担当，焕发出使命在肩、奋斗有我的精气神。

树立选人用人“风向标”。正确用人导向是对党员干部最大的激励，实干实绩导向越鲜明，就越会形成你追我赶、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。旗帜鲜明地亮明“有为”才“有位”这一标尺，把政治标准和实绩依据更好地统筹起来、联系起来，看有没有对理想信念的虔诚、对党的事业的忠诚、对人民群众的赤诚，能不能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、做好本职工作上充满激情、富于创造、勇于担当。坚持事业为上、依事择人，五湖四海、任人唯贤，持续开展非特定目的、交互式谈心谈话，深化党员干部日常了解，大力营造谁有本事谁来、谁有潜力谁上、谁先成才谁先上的浓厚氛围，让党员干部相信，只要干得出色、干出定力，组织一定会看到，自己就一定有舞台、有前途、有奔头。

改进考核评价“指挥棒”。考准考实党员干部业绩并且奖优罚劣、赏罚分明，就能够为党员干部确立起奋进的航标。坚持以实绩论英雄，优化改进绩效考核方案，在指标设置上更加精准集约，在分层分类上更加体现差异，既看当年也看往年，既看显绩也看潜绩，既看绝对水平也看动态变

化，完善优化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，引导大家咬定目标，比学赶超。进一步加强成果运用，与选拔任用、培养教育、表彰奖励、管理监督等结合起来，让干得好的既受表彰又得实惠，让没考好的既加压力又添动力。

锻造敢打善拼“硬本领”。现代化建设需要党员干部手里有几把“刷子”、掌握几门“硬功”。一方面，不断更新教育培训方法论，贯彻基本培训理念，建强优质资源“中央厨房”，持续办好领导干部专题培训、“科技产业前沿”双周讲座，创新场景式、情景式、案例式教学，引导党员干部更好把握全球科技前沿和产业变革趋势，深化对运行规律和底层逻辑的认识。另一方面，充分运用党员干部培养锻炼平台，拓宽党员干部到中央和国家机关、兄弟省市、中央在沪单位等学习锻炼渠道，让党员干部多一些到龙头企业、高成长企业、国际组织、驻外机构等的跟班式实训，到区域性、专项性重大任务或工作专班的“小组团”沉浸式锻炼，促进干部在实践实干中脱颖而出。

用好干事创业“护身符”。干事创业需要正向激励，也需要严格的纪律规矩保驾护航。党员干部越是明晰政策边界、“自律”往往也会做得更好，越能干净干事、大胆干事。把握好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之间内在统一的关系，更好地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结合起来，使党员干部真正把心实用在干事创业上。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，巩固深化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，引导党员干部把他律转化为自律、内化为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。同时，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者撑腰鼓劲，对因敢抓敢管遭遇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，及时澄清正名；对因敢闯敢试出现失误的，加以甄别，符合有关规定的要容错免责；对制度规定界限模糊的，明确情形、细化要求，让大家免去后顾之忧，放开手脚干事业，努力创造新时代发展的新奇迹。

（作者系上海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）

《禹贡》是《尚书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，托名大禹治水而作，故称《禹贡》。作为《尚书》中托名大禹治水的经典文献，《禹贡》的核心价值观在于以地理空间为载体，系统展现了早期中国对疆域治理的创造性思考。《禹贡》奠定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基础，具有极高的文化和学术价值。

作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奠基之作，首次提出了“九州”的空间概念，标志着中华文明空间观念的初步形成。《禹贡》将广袤的中华大地划分为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九个区域，称为“九州”。这种划分并非一种简单的方位描述，而是以自然地理特征为基础，结合资源分布与政治治理，构建出的一套完整的区域地理学模型，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深刻理解。

例如，冀州以黄河中游为核心，兖州以济水流域为主，青州以山东半岛的山川为界，这种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划分方式，既符合山川形便，又便于行政管理和资源调配，为中华文明的整合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框架。《禹贡》对九州的记述涵盖了自然地理（山川脉络、土壤植被）、经济地理（田赋等级、贡物种类）、人文地理（人口分布、道路交通）三大维度，形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性“地理志”的书写模式，呈现出超越实用主义的认知深度。

九州疆域以标志性的山川来划定，各州土壤按质地、颜色、肥力细分，植被状态甚至精确至草木疏密，同时还详细记载了各地的物产，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资源的认知和利用。这种兼具农业指导价值与资源普查性质的记述，可视作古代“国土调查”的雏形。在山川地理方面，《禹贡》详细记载了各地的山川名称、方位及脉络，勾勒了中国古代山川大势，呈现了当时文明区域水系图和黄河古道图，为研究古代河流变迁、山脉分布提供了重要依据，也为后世“郡县山川”的行政命名奠定了基础。

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空间治理体系，涵盖了地理、经济、政治等多个方面，体现了古代先贤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与智慧。书中详细记载了九州的山川、河流、湖泊等自然地理要素，通过对这些地理要素的描述与划分，为当时的土地利用、水利建设等提供了科学依据。例如，书中对九州的山川进行了系统的梳理，明确了各州的山脉走向与河流分布，为水利工程建设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。通过对九州地理环境的深入了解与合理利用，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开发与保护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。

《禹贡》提出了“任土作贡”的经济治理模式，根据各州的土地肥沃程度与物产特点，规定了相应的贡赋标准。这种模式充分考虑了各地区的经济差异，实现了资源的合理调配与利用。一方面，各州根据自身的经济优势向中央提供贡品，满足了国家的财政需求；另一方面，中央通过对贡赋的管理和调配，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。

此外，《禹贡》还对九州的交通路线进行了规划，强调了交通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。良好的交通网络不仅有利于贡赋的运输，也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，进一步加强了九州之间的经济联系。

在政治层面，《禹贡》所构建的空间治理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。通过对九州的划分与治理，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和控制。九州的划分明确了各地区的行政归属与管理职责，使中央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政治决策与行政管理。同时，《禹贡》也为后世的政治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，成为中华文明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九州的治理模式强调了中央与地方的协调与合作，通过合理的行政区划与管理机制，实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稳定。

其中蕴含的“大一统”思想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，贯穿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，对后世的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禹贡》中的五服制构建了一种同心圆结构的权力辐射模型，体现了中国古代层级化和差异化治理的政治实验。五服制以王畿为中心，以“五百里”为单位向外扩展为甸服、侯服、绥服、要服、荒服五层，形成“核心—边缘”的差序格局。这种设计将地理距离与政治控制强度直接关联，成

《禹贡》中的九州划分与治理

□ 黄畅

为后世“郡县—藩属”二元治理结构的雏形。五服制并非僵化的边界，而是强调因俗而治的弹性，尤其对要服、荒服不进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，这与儒家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”的理念相通；《国语·周语》载，“先王之制，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……夷蛮要服，戎狄荒服”。可见，周代已将五服制发展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实践原则。

九州的划分与治理为“大一统”思想提供了地理基础。九州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，涵盖了中华大地的主要区域，通过对九州的统一治理，不仅实现了地理上的整合，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政治统一的思想基础。这种统一不仅体现在对土地的管理和利用上，更体现在对各地人口的统一管理和凝聚上。九州的划分使中华大地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，为后续的政治统一与文化传承创造了条件。

《禹贡》所构建的空间治理体系为“大一统”思想的政治内涵奠定了基础。通过对九州的治理，中央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各地区，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与稳定。九州的划分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，使中央能够更加高效地进行政治决策与行政管理。这种政治统一不仅体现在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上，更体现在对国家整体的一统规划与治理上。九州的治理模式为后世的政治制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启示，成为中华文明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九州的划分与治理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，实现了文化上的统一与传承。通过对九州的统一治理，各地区的文化得以相互交流与借鉴，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。九州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的传播上，更体现在精神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上。九州的治理模式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与载体，使中华文化在广阔的土地上得以延续与发展。

《禹贡》开创了中国特有的治理传统，九州从地理概念发展为王朝正统性的象征，后世帝王多效法“禹迹”宣示主权。五服制从空间模型演变为“华夷之辨”的文化边界。这种将自然地理制度化为文明符号的思维模式，使《禹贡》超越地域治理手册的范畴，成为中华文明空间政治学的元典。其价值不仅在于战国时期的具体制度设计，更在于为多民族大国治理提供了“差异中求统一”的重要理念。